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典立法回眸①

推动观念变革社会进步的共同记忆

阿 计



1989年:《行政诉讼法》

改革开放前,当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权益之时,多数人选择的是沉默,即使一些人试图通过告状讨说法,但法律并未设立这项制度,让他们堂而皇之地步入寻求司法救济的大门。

如今,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并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已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认同。社会观念的这一深刻变迁,以及约束公权、保障民权的制度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

法制重建启动后,《刑法》、《民法通则》等重要法律相继问世,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已形成,但行政诉讼制度、即民间所称的“民告官”却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

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

一方面,《行政诉讼法》唤醒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激起了他们寻求公道和正义的勇气。《行政诉讼法》施行近20年来,反映各种公民与行政权力之间利益冲突的诉讼时有发生,据2007年统计,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诉讼案已突破10万件。另一方面,《行政诉讼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模式和思维定势,昔日“说一不二”的行政行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行政行为为也有犯错的可能,而普通百姓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忍受过错对他们的侵犯。从此之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成为政府转变管理理念的重要标志。

也正是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起,我国行政立法开始具有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转变。由于历史原因,法制重建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行政立法多偏重于授予政府以权威,忽略了对行政权力应有的约束。但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出台,程序公正、程序正义的立法思维得以确立,以监督权力、保护公民权益为要旨的“控权行政法”纷纷出台。此后十多年间,《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亦草案初成。时至今日,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对行政权力进行科学规范的法律制约,为行政侵权的受害者提供了全过程的法律救济。

《行政诉讼法》实施,对政府与公民、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之一。《行政诉讼法》在纠正行政错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推动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快速提升了中国法制的现代性、公正性和民主性。

1994年:《国家赔偿法》

行使公共权力可能会出现错误、可能会构成侵权,受害者有权要求其承认错误、纠正侵权。这些观念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执掌权力的国家机关,需要为它的错误和侵权行为

1989年:《行政诉讼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重建,开启了一个波澜壮阔、延续至今的“立法时代”。经过30年的努力,截至2008年年中,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229部、行政法规近600部、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已做到有法可依,国家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

30年的立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改革开放史。尤

1994年:《国家赔偿法》

临近年终,农民工讨薪案件越来越多。日前记者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外地来京务工的三名农民工在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下,终于从北京某建设开发公司的代理人手中,拿到了拖欠了近两年的三万余元血汗钱。

朱某某等三名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系来自河北、河南的农民工。2005年4月至2007年8月17日在北京某建设开发总公司工作,三人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07年8月,该公司以裁员为由口头通知三名农民工解除劳动关系。

三名农民工认为,公司应当向三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而且公司还拖欠了三人工作以来的奖金和加班工资,遂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及时给付相关工资及额外经济补偿金。

建设开发公司则认为,三名劳动者是因为不服从工作安排,公司才对三人作出开除处理,且工资中并没有设奖金一项,不认可劳动者有加班行为。

在一中院审理期间,法官经深入了解发

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

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这就要求刑事诉讼制度合理平衡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不仅谋取结果的正义,更须追求程序的正义。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提升司法民主,推进司法公正,是《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改时的基本出发点:为了防止司法机关侵

1997年新《刑法》

1979年实施的《刑法》填补了我国刑事法制的空白,但也留下了过于原则、简约的缺憾,尤其是规定了在理论上可以对公民造成潜在威胁的“类推制度”,即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依照《刑法》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的制度,与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发生严重冲突。

1997年新《刑法》的修改,与老《刑法》相比,法条由192条增加到452条,字数由2.2万上升到6.7万。这不仅意味着新《刑法》是当时已经修改过的法律中变动最大的一部,同时也意味着新《刑法》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的一部法律,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刑法典。

新《刑法》最大的变革,莫过于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核心标志。

随着“罪刑法定”成为新《刑法》的思想主线,昔日的“类推制度”得以废除,刑事罪名也由1979年《刑法》的200多种细化,增加到了400多种,这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法律准绳。

不仅如此,“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中的确立,从根本上推动了执法观念和执法行为的理性化。有统计表明,新《刑法》诞生后两年内,各级法院宣告无罪数千件刑事案件中,有很大比例就是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作出的判决。

新《刑法》诞生的前一年,我国已经完成了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连续两年对两部刑事大法实施重大改造,足以证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向现代化法制体系阔步迈进的速度。正是从那一刻起,一个从理念、制度到实践深度转型的刑事司法新时代开启了。

现,作为用人单位的建设开发公司主要是因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发生纠纷,一定程度上存在与三名劳动者斗气的情绪,故意拖延时间。而三位劳动者也因长期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为此,承办法官有针对性地找准案件的切入点,对用人单位相关负责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一言一句的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陈述,充分赢得了双方的好感和信任。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并在签订调解协议的同时,当庭将拖欠的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和额外经济补偿金共计三万九千多元案款全部给付三名劳动者。因拖欠工资引发的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在一般的刑法学中将“罪刑法定”原则和“类推”原则对立起来,“类推”是“对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适用现行刑事法律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处断。”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中确立,在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意义应该是:只要法律没有限制的行为,都是人们可以做的,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陈明)